

“十大”系列丛刊



十大谋士



黄行发 主编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大”系列丛刊

十大谋士



黄行发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沪新登字109号

“十大”系列丛刊

十大谋士

黄行发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6.375 插页5 字数100,000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000

ISBN 7-5325-1403-X

I·686 定价: 2.55元

前 言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历代统治者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当他们对社会实行统治时，君王这种权力的无限性与自身思维能力与才识的有限性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就必须借助别人的思维，以作为自己思维的扩展与延伸，必须利用他人的智慧和学问，以弥补本身才智的不足。于是，在历代统治者周围，总有一批谋略之士，他们依靠自己的知识、才能、经验与思维能力，帮助统治者审时度势，出谋献策，运筹帷幄，治国兴邦。这一类足智多谋的人才，在中国古代就号称智囊。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着汉高祖刘邦说过的

话：“夫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秦末汉初之时，项羽与刘邦争夺天下，项羽拥兵四十万之众，部将勇猛如虎，他本人“力拔山兮气盖世”，可谓强矣；而刘邦仅有十万人马，但那里却“智士如云”，手下有张良、萧何、酈食其等出类拔萃的谋士。项羽是个刚愎自用的武夫，不善于用智士，不少人给气跑了。连已功拜都尉的陈平，亦封金挂印，仗剑而去，后来投奔到刘邦门下，还施了个反间计，使项羽的军师范增被迫告老还乡，最终郁闷成疾，抱病而死，项羽最后也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自刎于乌江。

这种得谋士而得天下的情况，在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中，上自夏、商、周，下迄元、明、清，比比皆是。周朝的西伯姬昌、姬发父子俩，自从有了姜子牙，才实现了消灭商纣、建立周王朝的夙愿。战国时期的张仪，凭借秦国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积极施展其连横之术，为全国统一大业作出了贡献。三国时代，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一个诸葛孔明，才使自己从险无立足之地的劣势，转化为魏、蜀、吴三强鼎立的局面。赵匡胤微服觅赵普，引出了“强干弱枝之术”与“杯酒释兵权之法”，对

于建立和巩固宋王朝起了重大作用。成吉思汗与儿子窝阔台，利用耶律楚材的胆识与熟悉中原文化的特长，辅佐他们南征北战，为建立大一统的元朝政权奠定了基础；继而刘秉忠劝谏忽必烈遵用“汉法”平治漠南，并吸取蒙、汉历史上成功的统治经验，替元朝制订“一代成宪”，为缔造多民族的封建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朱元璋由于得到了刘伯温的帮助，才如蛟龙得水，战胜了劲敌陈友谅、张士诚，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经历了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袞与福临三朝统治的清初谋士范文程，提出并帮助推行“统一天下，安抚百姓”的方针，对于满族统治集团夺取全国政权和巩固政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见，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统治者，总是极其重视招贤纳士，延揽智囊人物，并注意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自己正确、及时地作出重要决策或采取重大政治、军事行动提供智力上的支持。凡是善于这样做的统治者，常常得人心，并使大业获得成功；凡是不能这样做或者有时不愿意这样做时，就往往遭受挫折，甚至身败名裂。

当然，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这些智囊人物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他们活动的特点是个体性的，仅仅凭借经验判断进行谋策，并且有很大的随机性。他们能否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以及

作用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背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君王的贤明与否以及贤明的程度如何而定。此外，谋士们声价的消长，与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也有着密切的关联。往往在社会动荡、群雄割据、天下纷争或在政权更迭时，国君比较注重人才，渴望招贤，甚至不惜代价，网罗有识之士，因为争取到一个有声望的人物，还能增强自己的政治号召力。在这种情况下，人才流动性较大，谋士们常常奔走四方，毛遂自荐，择主而仕，以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但一旦大业已定，统治者稳操胜券时，就会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谋士在辅佐君王创业活动中形成的显赫功绩和崇高威望，常常导致“功高震主”，统治者将其视为一种离心力量而要竭力加以排斥。所以，历史上有不少谋士，虽为统治者尽心尽职，但最后或急流勇退，或不得善终。这是封建统治无法避免的悲剧。

然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先后出现的一批又一批智囊人物和对社会进步有贡献的谋略家，他们胸怀大志，深谋远虑，果断决策，辅佐统治者开国安邦，从而在历史舞台上导演了一幕幕精采的活剧，为推进社会发展立下了不朽功绩。由于各人所处时代的不同和自身才能的差异，从而又显示出他们各自丰富的个性特点。他们的才智、谋略以及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说是人类思想的结晶，其精华也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组成部分。

对于本书的选目，我们曾颇费斟酌。一方面，中国历代谋士众多，选此选彼，见仁见智；另一方面，有些大家熟悉并公认可称为大谋士的人物，如萧何、诸葛亮、房玄龄、耶律楚材等，已收入“十大系列丛刊”其他本子中，为避免重复，本书不能再入选。因此，现在选定的十位谋士，是按照我们的理解，选择在历史上有较大影响，有突出才能，又是在各个朝代中有一定代表性的智囊人物。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介绍张仪时，连带也写到了苏秦，这是因为“连横”和“合纵”是两个对立的谋略，人们也习惯上把两者并提。因此本书实际上介绍了十一位谋士，但仍按本系列丛刊体例，以“十大”名之。另外，为了给读者提供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编写时对史料都作过一番稽考。当然，对于史料也有个鉴别与理解的问题，如《史记》记载张仪与苏秦的有些情节，与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就有相背之处；又如范文程曾经做过奴隶，而《清史稿》本传及其他有关记述对此均讳莫如深。编写者则根据自己掌握的现有史料，作了适当订正。本书收录的人物都不是完人，而是功过皆有、瑕瑜互见，有的在历史上亦褒贬不一。由于我们是从谋士这个角度来审视这些人物的，

所以重点突出一个“谋”字，努力反映他们的谋略思想与行为，对于他们的其他方面，没有也不可能作全面的介绍和评价。偏颇之处，敬请专家与广大读者赐教。

黄行发

1992年4月于华阳小居

84727

目 录

1	前 言	黄行发
1	吕 尚	虞信棠
16	张 仪(附苏秦)	虞信棠
35	张 良	周琪生
53	范 增	虞信棠
70	郭 嘉	吴慈生
90	李 泌	田 雨
115	赵 普	陈 军
134	刘秉忠	吴慈生
151	刘 基	陈 军
175	范文程	张 玟

吕 尚

旧时民居的大门上，常常张贴着“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题字。这位在民间传说中被神化成具有驱邪避恶能力的“姜太公”，就是在商、周之交辅佐周武王灭商的历史人物吕尚。

吕尚，本姓姜，名牙（一说名尚，字牙）。古人常以“子”作为对男子的美称或尊称，故又称“姜子牙”。相传吕尚的祖先系神农氏后裔，“尝为四岳”，是辅佐虞舜的四方部落首领之一；因协助夏禹治水有功而就封于吕（今河南南阳西），后代遂以封地之名为姓氏。到商代，吕氏已降为平民百姓了。

关于吕尚的身世，因古代典籍记载阙如，今天已难以详细考证，留传下来的，只有一鳞半爪的资料。据说，吕尚出身贫寒，不但青壮年时期十分清苦，年逾花甲仍非常穷困。他曾在都城朝歌屠牛

为生，还在古渡口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孟县西南）卖酒度日。因为生计窘迫，妻子离开了他。据此推测，吕尚的身份当是社会下层的庶民。不过，在司马迁的《史记》里，也有“太公（吕尚）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的记载。按司马迁的说法，吕尚曾在商王朝为官，当过商纣王的臣子，因纣王昏愤无道，才弃官离京；而且，吕尚还曾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主张，因为未遇贤明的“知己之主”，最后才投奔周西伯姬昌。

又据传说，吕尚“去商就周”已年届七十；也有的说，吕尚遇文王（姬昌）已年届八十。总之，当时的吕尚已是一位耄耋长者。古人称七十岁老人为“耄”（也有称七十为“耄”，八十为“耋”的说法），格外尊敬。《左传》（“僖公九年”）就有“以伯舅耄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的记载，说明那时候的耄耋老人，不但有特别赏赐，还可免除“下拜”之类的礼节。古人对年逾七十的老人之所以特别崇敬，不仅是因为这些长者年逾古稀，德高望重，更在于这些长者历经沧桑、见闻广博，不但各方面知识丰富，而且处事论世见地成熟。因此，无论吕尚出身如何，司马迁所说的“太公博闻”，当是可信的。

根据年龄推算，吕尚当曾生活在商王朝末期的帝乙、帝辛当政时代。帝乙穷兵黩武，连年对江

淮地区的东夷用兵，又把都城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迁到朝歌（今河南淇县）。尽管这些政治活动在客观上对推进江淮地区的文明进程或多或少起了促进作用，但为了保证庞大的军费开支和营建新都的需要，则不断加重对平民百姓的经济剥削和掠夺。继帝乙当政的帝辛，就是纣。纣是一个更暴戾的国君。他不仅亲自率兵东征，继续进行掠夺奴隶和财富的战争；还进一步扩大王都范围，南距朝歌，北至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在新建的宫苑中，建造琼室玉门，收罗狗马奇物；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彻夜饮酒作乐，荒淫无度。纣王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还制订和实行了炮烙（即把铜柱置于炭火中，让受刑者抱住铜柱，活活烙炙而死）、醢脯（即把活人砍成肉酱，做成肉脯）等惨绝人寰的严刑酷法，残害无辜。

长期生活在都城的吕尚，不仅对商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状况有深刻的了解，对商王朝的黑暗、腐败、没落有清晰的认识；而且从耳闻目睹、亲身感受的“如螟如蟥，如沸如羹”的社会现状中，不断洞悉奴隶和平民与贵族统治者之间、方国部落与商王朝之间，以及贵族统治者相互之间空前尖锐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朝歌，不但是商王朝的政治中心，也是商王朝的军事中心；孟津，不但是黄河上的重要渡口，也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塞。吕

尚长期在这两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镇生活，除了对战争给社会经济造成的破坏和给人民带来的生离死别、颠沛流离的痛苦有深切感受外，更重要的是，连绵的战争和频繁的军事活动，为具有军事天赋的吕尚提供了认识战争、学习战争、潜研韬略、精究计谋的条件。

具有战略家深邃目光的吕尚，意识到赫赫扬扬的殷商王朝“气数已尽”，已经走到了自己历史的尽头，于是毅然“去商就周”，西归正在生机勃勃地发展和壮大的周方国部落。

周，是一个古老的部落。传说，周人的始祖弃做过夏朝的农官，活动在郃（今陕西武功县西南）一带。到了曾孙公刘，开始在豳（今陕西旬邑西南）定居，使农业和家畜饲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公刘的十世孙古公亶父，为了避开游牧部落薰鬻戎狄的骚扰，率领族人从豳迁居到岐山之南的周原（包括今陕西扶风、岐山、凤翔、武功等县），从此，这一部落便称为“周”。周原水源丰富，土地肥沃，宜于耕植，正如《诗经》中赞美的那样：“周原臞臞，莠荼如飴。”在这片沃土上生长的野菜，也像饴糖那样甜沁可口。在古公亶父及其子姬历的带领下，周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积极吸收商文化，多次征伐鬼方等戎狄部落，逐步发展成为商王朝西部的一个强大方国。

面对日益强大的周方国，商王朝开始感到对自己的威胁。为了遏制周的势力，商王文丁处死了姬历。姬历死后，其子姬昌嗣位，称西伯侯。姬昌执政后，周在名义上虽仍在商王朝属国范围内，但对商王朝的离心力和敌对情绪却在不断加剧。商在帝乙即位后，曾招诱一些方国部落的奴隶逃亡，并攫为己有。这件事，引起了那些逃失奴隶的方国部落首领的不满和怨恨。姬昌趁机倡议公约，提出：谁家的奴隶仍归谁家，不准藏匿，否则要大搜查。这一倡议，得到了许多方国部落的响应。周方国不但因此提高了声望和号召力，而且加强了反商力量的联络。不仅如此，日趋强盛的周方国还曾对商王朝用兵。据《竹书纪年》记载：帝乙（纣王）“二年，周人伐商”。那时周的力量虽然还不足以与商王朝匹敌，但其咄咄逼人之势，再一次震惊了商王朝。商纣王将姬昌招来，囚于羑里，意欲使周方国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可是，昏愤的商纣王终究经不起美女、骏马和奇珍异宝的引诱，在被重金买通的费仲等奸佞亲信的劝唆下，还是放了姬昌。据说，姬昌的僚臣散宜生、闢夭等人用重金赎主的这一计谋，就出自素有贤名的吕尚。

西伯侯姬昌在羑里度过了两年囹圄生活后，并未稍减励精图治、伐纣翦商的宏图大志。但面对现实，他清醒地意识到，现有的经济、军事力量

还远不足成此大业。他渴望能辅佐他实现宏图大业的贤人的出现。吕尚的到来，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夙愿。

关于吕尚与西伯侯的相遇，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充满神奇色彩的佳话：

有一次，西伯侯想外出打猎，让太史占卜征询神意。占卜后，太史稟告说：“这次出猎，卜兆吉祥。得到的，既不是螭龙，也不是虎黑，而是辅佐国君的贤才。”西伯侯听了非常高兴，兴冲冲带着随从驰骋于岐山脚下、渭水河畔。这时，吕尚也西行来到岐山脚下，但他既不诣府拜谒，也不登门访求，而是每日去渭水边的兹泉磻溪垂钓。钓了三天三夜，却不见一条鱼儿上钩。原来，他的鱼钩是直的，所以一无收获。可是，吕尚却自言自语地说：“愿意来的，我才钓。”后人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说的就是这段故事。对于这段故事，有人解释说，这是吕尚借垂钓恭候西伯侯到来；也有的说，这是吕尚为考察西伯侯是不是真正的“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贤明君主而特意安排的。西伯侯狩猎途经渭水之南，见一老翁独自在磻溪边垂钓，便下车步行，上前恭敬行礼。吕尚见西伯侯如此温良谦恭，十分高兴，便与西伯侯交谈起来。他们从为人之道说到治国之本，由天下形势论及用兵谋略，谈论契合，相见恨晚。西伯侯兴奋地说：

“我先君太公（即古公亶父）曾留有遗言说：‘必定有圣人来这里，帮助周族兴盛。’您大概真是这样的圣人吧！我太公盼望您很久了。”西伯侯当即将“太公望”吕尚请上自己的行车，一起回朝，并拜为师。从此，吕尚成为西伯侯姬昌的辅政谋士，展开了叱咤风云、谋取天下的宏图大略。

作为西伯侯的辅政谋士，吕尚深知要实现“伐纣翦商，取而代之”的宏伟大业，必须不断发展和壮大自身力量，孤立对方，并逐步削弱敌方的实力。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谋略。

吕尚提出的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谋略中带有根本性的大计是：充分肯定、继续推行“行礼治、修德政”的国策。

西伯侯执政后，遵后稷、公刘之业，行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士多因此纷纷归附。从“伐纣翦商，谋取天下”大业出发，强调“礼治、德政”国策，不但对继续招纳各方面人才、实现富国强兵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对进一步揭露商纣王朝的酷戾暴政，从而激发正义力量唾弃、推翻这种暴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只有强烈的对比，才有鲜明的取舍，吕尚从“讨伐无道，取而代之”的高度强调西伯侯“礼治、德政”国策的谋略，遵循的正是这样一个道理。

事实正是如此。暴戾的商纣王，不但对反抗